

暨南史学丛书



中外文化交流与港澳史探赜

叶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外文化交流与港澳史探赜

叶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外文化交流与港澳史探赜 / 叶农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5
ISBN 978 - 7 - 5203 - 4241 - 4

I. ①中… II. ①叶… III. ①中外关系—文化交流—文化史②香港—地方史
③澳门—地方史 IV. ①G125②K296. 58③K296.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5866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 芳
责任校对 闫 萃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
插 页 2
字 数 302 千字
定 价 8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暨南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经费资助丛书

序 言

从16世纪开始，以葡萄牙人为代表的欧洲人开辟了一条通往东方的航线，将以欧洲文明为特色的“西洋”与以中华文化为特色的“东洋”，通过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联系了起来；与此同时也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大航海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大特色应该是东西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了起来，从此东西方开始了文化交流，共创了一个东西交流的新局面！

自葡萄牙人于16世纪中叶入居澳门以来，澳门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窗口。自鸦片战争之后，香港被割让给了英国，从此香港又继澳门之后，成为另外一个东西文化交流的窗口。

作为东西两洋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窗口，澳门与香港地区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澳门与香港而言，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体系。近年来，学术界一直在努力构建“澳门学”与“香港学”的学科体系。

以“澳门学”为例，明中叶以来，澳门在走向中国、连接世界的大航海浪潮以及全球化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创造了影响近代世界进程的极为辉煌的大历史。它不仅是16—19世纪远东地区最繁盛的贸易中转口岸，吸引了亚洲、欧洲及美洲数十个国家的商贾、教士及移民停留与居住，更是东西方各种宗教、文化碰撞之地，成为几百年间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的桥梁。以澳门—长崎、澳门—果亚、澳门—马尼拉三条航线建构起来的国际贸易场景图，其描绘的是，澳门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港口以及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重要枢纽，成为近代中西方文明接触、交流和融合的重要平台，成为异质文明相互交融并产生新型文明的重要基地。



这个基地上演了一场人类文明大碰撞、大融合，以至孕育出新文明的壮丽情景：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习俗的民众以其各自的方式，各美其美，美美共生，由此诞生了既不同于中华文明，又迥异于西方文明的多元、包容、和谐的“澳门文化”，亦即葡萄牙学者潘日明（Benjamim Videira Pires）所称的“结合两不同文化而创造的第三文化”。

澳门中西文化的相互接触、交融，乃至尊重，可以概括为文明的“互动相生”模式。这种“互动相生”的文明形态的存在和发展，为“澳门学”创立人类文明传播与发展的新范式提供了学术上的可能。因此研究“澳门学”，既可以揭示人类文明传播与发展的新模式，又能开辟人类文明和谐相处的崭新旅程，为今天世界解决各种民族冲突提供重要的启示。

“澳门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问，以澳门深厚的历史及其研究为基础，建构以澳门历史和社会现实为核心内容，同时又能丰富世界历史认知的知识系统，揭示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澳门模式及其学术范式，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乃至和平的进程提供有价值的参照。

自“澳门学”概念提出以来，学术界积极挖掘“澳门学”内涵，凸显澳门文化的形成、形态及效应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澳门学作为一门地域性的、独具内涵的学科已具雏形。

自2010年以来，学术界先后召开了四次“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一届于2010年在澳门大学举办，主题为“澳门学研究的学理化与国际化”；第二届于2011年在葡萄牙里斯本科技大学举办，主题为“澳门学文献调查和澳门学实证研究”；第三届于2012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知识建构与学术成长：以澳门学为例”；第四届于2015年在澳门大学举办，主题为“文献基础与学科建设”；第五届于2017年在广州暨南大学举办，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知识建构与学术成长：以澳门学为例”；分别就澳门学的学理化与国际化、文献调查和澳门学实证研究、澳门学知识建构与学术成长、文献基础与学科建设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大大地推动了澳门学研究工作。

自香港地区被英国割占后，香港成为中国沿海另外一个重要的贸



易中转口岸，以此为基础，香港亦成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的桥梁，逐渐取代了澳门的角色与地位。1984年8月，香港《经济导报》社编辑部主任陈可焜发表《香港热·香港经济研究·香港学》一文，提出了建立“香港学”这门新兴学科的主张，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海外研究者积极回应与广泛支持，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研究著作。

由此可见，一个学术研究的场景图显现出来：透过中西交流，可以研究“澳门学”与“香港学”；反之，透过“澳门学”与“香港学”，又可以将研究领域，扩展到中外文化交流的新领域。

笔者自20世纪90年代投身港澳历史文化研究以来，即遵循这个场景图，从澳门历史文化出发，逐渐扩展到天主教在华传播史、海外汉学等领域；从香港历史文化出发，逐渐扩展到基督教在华传播史；又从港澳历史文化研究出发，扩展到明清史、中外关系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由于这个研究的领域很广，需要研究的问题繁多，虽然穷尽一人之力，“皓首穷经”，难以涉猎所有的领域，并在每个领域都取得辉煌的成果。故笔者只能在宗教、汉学、港澳历史文化等领域，做一定的涉猎。

二十余年来，孜孜以求，一直在这片园地上耕耘，虽然已经尽了个人之最大努力，但与付出的辛勤汗水相比，所取得的成果还是相当有限。因此，此次论文集的出版，将二十余年以来相关研究的部分论文集结起来，并分两个部分编排：全集共收录论文16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共收录论文10篇；下编共收录论文6篇。

限于学识，文中存在着的各种问题，甚至是常识问题，虽然尽力将其消除，但错误就像秋天的落叶一样，总扫总有，越扫越有，故笔者愿意承担此文责。在此，亦系抛砖引玉，就正于大方之家。望各位君子，不吝赐教！

叶 农

丁酉年二月初三日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广州暨南苑

目 录

序 言	(1)
-----------	-----

上编 中外文化交流

20 世纪上半叶广州华人浸信自立教会的兴起与发展	(3)
明清时期广州与西洋钟表贸易	(30)
明清时期天主教著作插图版画与传教	(46)
“西来孔子”	
——艾儒略中文著述与传教工作考述	(62)
美南浸信会与广州东山口：一个历史宗教地理学的典型范例	(74)
《大西利西泰子传》与张维枢考述	(96)
从《利玛传》到《畴人传》	
——明清时期耶稣会士利玛窦传记探略	(109)
与巨人同行者：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庞迪我及其中文著作	(126)
明清时期天主教“圣母领报”故事版画研究	
——兼论天主教《圣经》的图像化翻译	(154)
明清时期《几何原本》传承问题探略	(181)

下编 港澳史研究

明清时期澳门城市发展研究	(205)
澳门《知新报》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226)
明清时期澳门戏曲与戏剧发展探略	(255)



19 世纪后半叶澳门葡萄牙人移居香港考	(270)
前山同知魏恒与晚清社会初探	(287)
20 世纪前期香港葡人的族群认同	(296)

上编 中外文化交流

20 世纪上半叶广州华人浸信自立教会的兴起与发展

在 19 世纪 40 年代以后，基督教中的一个重要宗派——浸信宗，由美国传教士传入了广州。^① 从此，广州成为浸信会在中国传教的重要基地。尤其是在 20 世纪初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的影响下，广州浸信会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即华人自立浸信会兴起并发展。

目前，学术界对浸信会已经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如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著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吴立乐编《浸会在华布道百年史略》，刘粤声编《广州基督教概况、两广浸信会史略》，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〇一——一九二〇）》，徐松石编《华人浸信会史录》，Margaret M. Coughlin 著 *Strangers in the House: J. Lewis Shuck and Issachar Ro-*

① 基督教浸信宗传入广州始于 1844 年。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I. J. Roberts）于 5 月 15 日来到广州传教，开始了浸信会在广州活动的历史（参见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9 页）。而美国浸信会的另一名传教士弗吉尼亚州里士满（Richmond, Virginia）第一浸信会的叔未士夫妇（Rev. Jehu Lewis Shuck, 1812—1863；叔何显理，Henrietta Hall Shuck, 1817—1844）亦于 1845 年 4 月初从香港来广州传教（参见 Margaret M. Coughlin, *Strangers in the House: J. Lewis Shuck and Issachar Roberts: First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ies to Chin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h. D., June, 1972, p. 90；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第 161 页）。从此开始了浸信会在广州的发展，但到 19 世纪末，浸信会在广州的传教工作是由美国传教士主导的。如欧阳佐翔指出：“当时中国基督教会，尚处萌芽时期，教堂的兴建、传道人的薪金、堂务的经费等，大多仰给外国的差会，致使教会甚至一般会友被人视为洋奴。”参见欧阳佐翔《前贤景行录》，浸信会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1 页。



berts, *First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ies to China*, Theron Brown 编 *The Canton Baptist Memorial, Being a Historical Discours Belivered before the Baptist Church in Canton, Mass., at the Celebration of Their Fiftieth Anniversary*, 等等。但是,专门研究华人自立教会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研究这些教会教徒与牧师的成果,并不多见。

本书将通过现存的广州7个华人浸信自立教会教徒的名册,来探讨一下广州华人自立运动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华人教会的建立、发展及其教友的一些情况来解决上述的问题。

一 广州华人自立教会兴起的历史背景与原因

广州在20世纪初兴起华人自立运动是与中国教会自立运动紧密联系和分不开的。中国教会自立运动是中国教会发展史,特别是基督教教会发展史上的头等大事。^①中国教会自立运动萌芽始于19世纪60年代。李金强教授指出:“中国教会的自立运动,早于1862年,厦门闽南长老会,在该会传教士主导下,首先成立‘漳泉大会’,实行自养自治,为中国教会自立运动的先声。”^②

在20世纪前20年里,中国教会自立运动蓬勃发展,出现了由以前以美国传教士传教为主,转而以华人教牧人员承接传教,自立教会纷纷出现的新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是有以下原因的。

第一,在19世纪中后期,基督教来华传教,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外国传教士凭借了不平等条约给予的特权,因此这种侵华“洋教”(foreign church)遭到中国人的普遍反对,民教冲突不断,教案频繁发生。面对群情激愤,华人基督教友意识到教会必须改变19世纪以来由以外国传教士掌握的差会为主进行传教的局面,进而掀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中国教会自立运动。李金强教授说:

^① 参见李金强《自立与关怀:香港浸信教会百年史,1901—2001》,香港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9页。

^② 同上。



华人教友遂觉醒教会须要“改头换面”，脱去“洋教”外衣，由此促成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教会自立运动的产生。此一运动目标乃要求脱离西差会或教士的管治与供养，传教主权，实行三自，进而联合各教会，而最终达成建立具有与中国文化结合的本色化自立教会。^①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主席罗炳生（E. C. Lobenstine）在《中华归主》序言中指出：

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国青年最近在《教务杂志》上发表议论说：“传教士的工作虽然很有成绩，但没有成功地在中国基督教中建立起对教会工作的主人翁感。”他的话是对的，他指出了一种确实存在的可悲事实。今后几年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中国教友中树立对教会的主人翁感，使教会真正成为中国的教会。^②

而在该报告“第十章 中国教会 第二节 自立的中国教会”中亦指出：

在中国许多地方，几乎在每一个大宗派里都有一种健康的自养、自治、自传运动在进展中……中国人要求一个洗去了洋教污名的教会，这个愿望促使若干中国基督徒组织与各宣教会所建立的教会组织毫无关系的教会……^③

第二，浸信宗派的特色所致。浸信宗派特色是“强调宗教自由与宽容

① 参见李金强《自立与关怀：香港浸信教会百年史，1901—2001》，第 39 页。

②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〇一——一九二〇）》第 1 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导言”，第 10 页。

③ 参见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〇一——一九二〇）》第 2 册，第 817 页。



等信条……以‘信而受浸’、‘教友平等’及‘独立自主的地方教会’”^①，故该会的教徒均受此影响，有了自立、自治的意识、要求与传统。

另据《两广浸信会联合会刊》所载的《两广浸信会的信仰、组织与精神》一文介绍：

体制组织：浸信会的体制既然是根据新约圣经的教义，所以每个会友都有其独立自主的向神崇拜，和对教会服务的义务。教会尊重每一个会友（不分阶级、性别）的意见，每一个会友对教会都有直接应负的责任，是一个最民主的，最富集体的教会……

独立精神：浸信会在两广是素以自立精神求教会的发展，每一个会友都奉献其资财，时间，才能为教会作宣传福音，服务人群；并在事业上也充分显出其独立自主的精神……^②

二 广州华人教会的自立运动历程

进入20世纪，受到中国教会自立运动的影响，广州掀起了一场基督教会自立运动。1903年至1933年，广州城内出现了一批华人自立教会，见表1。

表1 广州华人自立浸信会一览

教会名称	成立时间	教会名称	成立时间
慈爱浸信会	1903	东石浸信自立教会	1919. 1. 1
兴华浸信自立会	1904. 1. 23	洪桥浸信会	1920
救世自立浸信会	1905	惠爱八约浸信会	1923. 1. 1
东山浸信会	1909. 5. 2	蜆口浸信会	1926. 6. 6
沙河浸信会	1911. 1. 9	东山赖神会	1933. 8. 12

① 参见李金强《自立与关怀：香港浸信教会百年史，1901—2001》，第14页。

② 参见广东省档案馆藏第92卷宗第1目录第281号档案《两广浸信会联合会刊》1951年第6卷第1期（1951年1月15日），第2—3页。



其实,广州早在 1873 年 12 月 1 日就在潮音街就成立了第一个华人自立教会——华人宣道堂。但华人宣道会未能持久,它是后来的广州兴华浸信自立会的前身。

根据广东省档案馆所藏《广州兴华浸信自立会会友名册》,^① 兴华自立会在 1904 年自建教会以前的教徒有 17 名,约占总人数 1236 名的 1.4%。其中,男性有 13 位,女性有 4 位;他们的年龄,40 岁以下的有 4 人,41 岁至 60 岁有 8 人,60 岁以上有 3 人,未知者 2 人。他们的籍贯有:番禺 4 人,台山 3 人,新会 3 人,宝安、从化、东莞、肇庆、南海、高要、三水各 1 人。他们的职业有:商界 4 人,医护人员 5 人,教育界人士 4 人,传道与学界各 2 人,政界人士 1 人。他们中有 9 人受过教育,占总人数的 52.9%,受教育的水平很高。其中,受过初等教育有 3 人;受过中等教育者有 3 人;受过高等教育者有 3 人,最高学位有医学博士,参见表 2。

表 2

兴华会 1904 年前教友登记^②

姓名	性别	年龄(岁)	籍贯	入会时间	施浸牧师	职业	学历	荐入
王素波	女		番禺	前清	冯活泉	学界		
朱广炽	男	64	台山		显臣	商界		一号浸信会
李济良	男	67	新会	1875	纪好弼	教育兼医务传道	医学博士	八约教会
朱昌瑞	男	71	台山	1882	邓庚	商界		金山大埠教会
杨国文	男	18	番禺	1898	冯活泉	牙医		
杨丽容	女	48	高要	1899	冯景谦	传道	东山神学毕业	肇庆教会
张惠文	男	43	三水	1900	冯活泉	医界	医科	八约教会
钟慕廉	女	42	新会	1902	冯活泉	教育		八约教会
陈树芬	男	51	东莞	1902	冯活泉	商界		

^① 参见广东省档案馆藏第 92 卷宗第 1 目录第 267、268 号档案《广州兴华浸信自立会会友名册》。

^② 据《广州兴华浸信自立会会友名册》编制。



续表

姓名	性别	年龄(岁)	籍贯	入会时间	施浸牧师	职业	学历	荐人
姚日辉	男		宝安	1903	湛罗弼	中医	医学	清远教会
杨元熙	男	36	肇庆	1903	冯活泉	政界	土木工程 科硕士	八约教会
邝乐生	男	44	从化	1903	鲁子珍	教育	师范	从化教会
施伯声	男	46	新会	1903	冯活泉	西医	医科	
林德鉴	男	54	台山	1903	李济良	商界	读书8年	美浸信教会
何月仙	女	33	南海	1903	胡达臣	学界	培贤学 校毕业	
杨俊民	男	42	番禺	1903	冯活泉	印务	陆军速成	八约教会
杨国荃	男	38	番禺	1904	冯活泉	教育	大学	

华人宣道堂先后只有3位华人牧师：杨庆、黄梅、冯活泉。这与1835年至1900年在两广活动的浸信会美国传教士人数达到39位相比，^① 华人牧师只相当于美国牧师的7.4%左右。

1925年至1938年广州被日军占领之前，是这些华人自立会的发展时期。而在抗战时期，这些教会有的停止了活动，但仍有一些在坚持活动。

三 广州华人自立教会的建立与其教友研究

根据目前已有的资料和所掌握的档案，我们将分别研究这10个华人自立教会的情况，特别是教友的情况。

一 慈爱浸信会

该会始创于1903年。由美国传教士湛罗弼牧师出资购买十三甫烂屋两间为布道基址，取名慈爱福音堂，美南传道部聘请李惠亭驻堂

^① 参见吴立乐编《浸信会在华布道百年略史：1836—1936》，浸信会出版社1970年版，第33—34页。